

高一生、家父和那被迫沈默的時代

——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

周婉窈

開場白

今天能受邀來參加「高一生誕辰 100 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」是我個人莫大的光榮。不過，很遺憾地，我因故無法全程參加。這點雖然已經取得主辦單位的諒解，我還是感到很抱歉。唯一讓我能稍得寬解的是，我相信紀念高一生的研究會，這是個開始，將來我們應該繼續舉辦。或許下一次，讓我們在臺灣，在高一生那春天到來會開滿杜鵑花的故鄉見面。

關於高一生先生，我不像在座的許多前輩學者和後起之秀都做了學術方面的研究，我之所以受邀來這裡講點話，主要是因為我曾跟高英傑先生提過高一生影響家父的人生抉擇，也因此間接影響了我的人生。家父不認識高一生，這不是一個「私人」的故事，它反映了我們的時代。因此，今天我不是要來這裡講一個私人的故事，我希望能從這個類似大海的一個小漣漪的故事中，來探討、反省我們的歷史，來紀念我們的先輩對臺灣做出的犧牲和貢獻。只有透過我們的認識、體會，和再踐行，他們的犧牲才不落空，他們的貢獻才得彰顯。

本事

家父周進國先生於 2005 年 10 月 20 日去世，我無法再問他關於高一生的事情。我的父親是個沈默的人，他的個性的確是沈默的，不過，他的沈默是雙重的，另一重來自於戰後局勢，他和他同時代的無數的人一樣，被迫沈默。被迫對集體的過去、對政治的忿懣、對恐怖的記憶，徹底沈默。在解嚴之前，我的父親不曾提到高一生這個名字，他甚至不曾跟我們提及他的一位知交呂秋鎮被捕、被刑求至死的事。¹即使解嚴之後，長久習慣沈默的人，也不是一下子能把深藏於內心的話講出來——他們欠缺一套敘述的詞彙，甚或「失語」了。我的父親只有在我們問起，或聊天中無意中牽扯到，才會提及那被壓抑的過去的特定事物。

我不記得家父第一次提到高一生的名字是甚麼時候，但一定是在解嚴後很多年後。我一九九四年從加拿大返回臺灣，那時候，我完全不知道有高一生這個人，而我卻是個「專業臺灣史研究者」！慢慢地，我在一些材料中看到高一生的名字，

¹ 關於這位未曾謀面的世伯呂秋鎮，我曾寫一篇散文紀念他，篇名〈面向過去而生〉，見《當代》第 194 期（2003 年 10 月），頁 120-129。我的父母認為呂秋鎮被「刑死」。後來我把這篇文章給老朋友林世煜、胡慧玲伉儷看，他們長期從事人權工作，此文在友人之間傳閱，有朋友查資料，發現呂秋鎮經過判刑，因此應該遭處決，而非死於刑求過程。不過，當時一個人被抓，親友都嚇破膽，無從打聽，最後知道他死了，想成被刑求而死也是很合理的。如果將來我有機會把這篇文章收入文集，我想我不會去動原文，但會加一條註說明。我們對政治犯的實際遭遇的模糊不清，也多少見證了我們時代的「無知」——或更確切地說，我們的「無從知起」。

比較有印象的是鍾逸人的回憶錄《辛酸六十年》。²我知道書裡提到的湯川露子，就是我們年少時期紅極一時的歌星湯蘭花。由於湯蘭花是出身阿里山的「山胞」，我們嘉義人對他格外關心；當時我們不是很清楚原住民的分類，一概稱之為高山同胞。我真正對高一生產生興趣是在「臺灣e店」買到一張高一生歌曲唱片之後。那就是《春之佐保姬 臺灣傳記音樂 1 高一生紀念專輯》。³這些歌曲給我很大的震撼和感動。後來我請鍾逸人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來給演講，⁴並且在 2005 年歲末舉辦「高一生的音樂：聆賞與討論」，⁵都可以說是來自於這張 CD。

由於對高一生產生興趣，打電話回家時，我和家父談起高一，並且問達邦、特富野和「十字路」在哪裡，家父熟悉阿里山一帶地形，一一為我說明——我們小時候就常聽他提及「奮起湖」。我於是提議哪天我們一起到阿里山，家父很高興說好啊。這是個再也無法實現的夢想了。如前所述，家父不認識高一，但高一卻徹底影響了家父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家父於一九二七年出生於貧農家庭，九歲喪父，國民學校畢業後，曾當夜校小「先生」。一九四五年初，他被徵召為陸軍第二國民兵，當晚集合於嘉義郡役所待編，第二天隊伍移駐水上國民小學，編入誠二十五部隊，屬於嘉義三八飛行聯隊的地勤部隊。除了基本訓練外，主要工作是疏散飛機。當時空襲頻繁，飛機須疏散到附近村落竹林下掩護，以免被炸。飛機用曳引機拖走，他們可坐在機上。他在寫給我的回憶短文的結尾寫道：「日本於八月間投降，舉行敘別時，日本軍官均拔日本刀，帶領我們向日本天皇行最敬禮（搖拜），並說：『他們可再度來臺さよなら。』當時情景記憶猶新。」⁶

光復後，家父於一九四六年九月進入臺灣省立臺南師範學校就學，次年二二八事件發生，家父如同許多臺灣青年，跑到山區躲避。他曾告訴我，當時阿里山沿線都是共產黨勢力，他感覺很沒出路，一度也想加入共產黨。家父於一九四八年七月畢業，隨即分發至梅山國民學校任教，一九五〇年調至大林國民學校，一九五四年九月申請至阿里山香林國民學校服務，半年後因衣被不足，稚兒不堪寒凍，擬轉調不成，遂辭職下山。

家父到阿里山教書是一九五四年九月，那一年四月十七日，高一遭槍決。高一是著名的吳鳳鄉（今阿里山鄉）鄉長、曹族領袖，他被處死，對當時嘉南

² 鍾逸人，《辛酸六十年——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》（臺北：自由時代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 326-329。此一回憶錄第二部《辛酸六十年（下）》於 1995 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。

³ 新臺唱片 70011，1994。這是一張由高一生家屬、達邦村居民，以及陳素貞女士等相關人士共同錄製的第一張碟片。錄音地點：阿里山達邦村基督教長老教會·達邦活動中心。至今我仍為這張碟片的素樸風格所感動。

⁴ 2005 年 10 月 6 日，講題：「從我所認識的鄒族領袖高一談起」，地點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。

⁵ 日期時間：12 月 30 日下午 2：00-5：00，地點：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二樓會議室。音樂聆賞會的演出者：高英傑、莊素貞、鄭素峰、高英洋、陳素貞（演出兼解說）。討論會的引言人：王櫻芬、汪明輝、明立國、連憲升。當天音樂演出時，氣氛相當溫暖、熱絡。當時我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群的召集人。

⁶ 根據家父寫的回憶短文，寫在一頁五百字的稿紙上。年份不詳，大約一九九〇年前後，當時我旅居加拿大，正在撰寫博士論文，父親寄來供我參考。

一帶的知識青年，想必衝擊很大，至少家父深受恫嚇。家父自揣自己的思想不同於當局，說不定何時就會被捉去，因此惴惴不安。當他在當年九月帶這年輕的妻子和兩位稚兒上阿里山教書時，想必無時不想著高一生的事情。而且，家父應該也時常想起好朋友呂秋鎮，他也約在這個時候被捕。

我們可以想像一個自知思想不容於當局的年輕人內心的恐懼。一九五七年，家父得知中國青年黨在招募黨員，他想，既然自己的想法和國民黨這麼不同，不如加入合法政黨青年黨，可免嫌疑，又可得保護，像是躲入防空壕一樣（請注意：戰爭世代的比喻）。當時，青年黨嘉義縣黨部主委是戴桂生律師，家父搭車到嘉義市，怕被人看到，搭三輪車至戴宅申請入黨。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，家父（時年三十）與吳光耀、吳金木、張順強、田添南、彭布金等六位臺籍青年一起宣誓入黨，開始積極參與青年黨的地方與中央活動。⁷

由於家父加入青年黨，青年黨領袖曾琦、李璜、左舜生等人，都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耳熟能詳的人物；小鎮的知識青年的家父也因此有機會認識地方以外的民主人士——陳翰珍、朱文伯、黃順興、郭雨新等都是家父直接有交往的同志。一九六〇年，雷震醞釀組織新黨，至嘉義宣揚理念，招攬黨員，許竹模律師邀請有志之士參加會議，約五十人出席。家父應邀與會，並站在宣傳車上街遊行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嘉義地區的青年黨員，如彭布金、劉通響、張永清等人士是家中常客。後來我從高英傑先生那邊得知，彭布金⁸和高一生一家人很熟，高一生說他是 Karibi（蛤里味），他們都叫他「Kiguchi san」（木口先生）。我小時候，彭布金也常來我家，他身材高大魁梧，總是穿著西裝打領帶，戴著頂紳士帽，很有派頭。真是很奇妙的一種連繫！

家父加入青年黨之事起初是秘密，後來才公開。當時二二八事件餘悸猶在，肅殺之氣瀰而漫之，加入青年黨需要相當的決心和勇氣，此事可以說是家父一生的重大抉擇。青年黨雖然是花瓶政黨，但對一介臺籍青年似乎也的確能提供「防空壕」的保護作用。而這一切源自於高一生！

高一生的死亡對我父親造成那麼大的衝擊，我認為至少有兩層原因。其一，家父非常尊敬高一生，提到高一生時總是說「曹族的領袖高一生」（閩南語），⁹語氣帶著一種親切的崇敬。其次，家父某種程度把自己當成和高一生一樣，是情治單位要剷除的對象，所以「惴惴不安」。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家父在精神上認同高一生。他提到高一生時一定會加一句說，高一生的太太接到通知，趕到臺北，半路上高一生已經被處決了。在這樣「儉約」口傳敘述中，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嘉義一帶的人對受難家屬的同情。

關於高一生，家父還提到兩件事，都是口傳，不一定符合事實——我們要知

⁷ 家父曾擔任青年黨嘉義縣黨部主任委員十餘年，歷任該黨中央評議委員、中央執行委員等，並長期受聘為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，每遇選舉則奔走嘉義各鄉鎮。

⁸ 彭布金是嘉義縣梅山人（我母親說他是山裡人，很山內），據家父說，彭布金出身富家，二二八事件之後加入共產黨，遭逮捕，賣了很多地才買回一條命；他似乎屬於「自首」類。彭布金當過縣議員（大林、梅山、溪口區）。大林大埔美簡清芳也是共產黨，被捉，生死不明。國防部檔案中或許有彭布金和簡清芳的資料，茲記於此，留待年輕人研究。

⁹ 家父的世代，使用的漢字名稱應該是「曹族」而非後來人類學採用的「鄒族」。

